

破蛹之路——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廉如鉴

[摘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逻辑结构比较复杂,韦伯对其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也没有清楚界定。时至今日,韦伯是如何看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分析梳理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全书的论证逻辑,指出:在韦伯看来,两者之间既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相关关系。就像幼蝉破蛹而出成为蝉的过程一样,新教伦理是广义资本主义精神的早期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抛掉宗教的外衣,转化为富兰克林式的狭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关键词]: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行为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引发了学界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讨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讨论的焦点是:“韦伯本人是如何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由于《新教》一书论证结构复杂,而且韦伯没有对其中的基本概念作系统界定,所以人们对韦伯原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间建立的是因果联系[1]。另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之间建立的是较弱的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韦伯在建立两者之间相关关系时存在逻辑断裂[2]。第二层面讨论的是:“韦伯在两者之间建立的联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许多学者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不存在联系[3],而且资本主义行为的出现早于新教伦理的出现,并非韦伯所认为的新教伦理的出现早于近现代资本主义行为的出现[4]。

毫无疑问,不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第二层面的讨论意义更大,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第二层面的讨论应建立在第一层面讨论的基础上。但遗憾的是许多第二层面的讨论是在没有充分澄清第一层面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就难免产生许多空无着落的评论。许多批评韦伯者批评的其实不是韦伯的观点,许多为韦伯辩护者所辩护的其实也不是韦伯的观点。本文则专注于对第一层面的探讨,力图通过分析《新教》一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梳理清楚《新教》一书的论证逻辑,发现韦伯关于这一问题的真实原意,为在第二层面的探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对几个基本概念的澄清。

《新教》一书的论证逻辑之所以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韦伯所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精神含义复杂,韦伯本人也没有系统地界定这些概念。下

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它们。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精神。关于资本主义行为，韦伯下了一个非常广义的定义：“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获取利润的行为” [5]，按照这一定义，资本主义在其他文明里，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都广泛存在，只不过是以传统的形式存在，它们与近现代资本主义行为的区别在于理性化的程度上 [5]。韦伯没有给资本主义企业下一定义，只是对它的各种形式作了一些描述。但他明确地说：“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而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5]。可见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它包括一切从事资本主义行为的组织形式。只是到了近代的西方，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产生。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词的含义则复杂得多，在《新教》一书中它最常用的含义指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一书的书名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词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但是韦伯在书中对这一概念还有其它用法。1、由于行为总是与一定的精神、意义相关联（这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基点）。那么遍布各个文明并且古已有之的传统资本主义行为背后就有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般性地肯定通过交换获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它和各种传统习俗观念混合在一起，没有彻底地理性化。韦伯所列举的欧洲纺织业传统的放利人就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 [5]。2、新教伦理与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都被韦伯视为和“传统精神”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推动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这种广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于：它并非一般性地肯定通过交换获利的行为，而是认为，人是为了无限的利润而赚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而赚钱。赚钱成了生活的中心任务，它要求人们彻底抛开传统习俗和观念，完全在效率理性的支配下去经营事业 [5]。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在全世界是普遍存在的，但广义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是一种非常独特、仅在近代西欧才出现的精神现象。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有三种形式：传统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

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广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前面已谈到，新教伦理与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在下文有详细论述。

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只能以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面目出现

《新教》一书的核心内容是描绘出一个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这一线索就构成了韦伯这本书的论证逻辑。在澄清了以上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后我们就可以梳理这一逻辑结构。

韦伯通过对古今各种文明历史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企业广泛存在于各个文明、各个历史时期。但西方古代和其他文明中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程度很低。具体地说：1、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与政治军事等行为还没有完全分开，还有很强的投机性、非理性因素。2、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缺乏近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特有的性质：建立在自由雇用基础

上的理性化生产组织。

那么,传统资本主义是如何转化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呢?韦伯认为首先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相比,它把赚钱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它完全踢开了传统习俗、观念的羁绊,在彻底的效率理性指导下从事生产经营。正是在这种新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传统资本主义产生了革命,跨入近现代资本主义阶段。韦伯通过对欧洲纺织业经营方式变化的描述来形象地表现这一过程[5],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5],那么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出现的?鉴于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地区存在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许多人自然认为,新的精神是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酝酿出来的。韦伯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比例证:十四、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八世纪宾夕法尼亚。韦伯指出前者具有很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规模,但缺乏典型的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后者资本主义规模虽远远小于前者,却充满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他说“这些观念的起源(注:新资本主义精神)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精神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5]。这就是说,新观念的确立当然离不开经济、制度背景,但主要是观念斗争的结果。在最初阶段,新观念显得既违反人性情理,又为传统伦理和天主教教义所不容。“从个人幸福的观点看,它表达的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性: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5]“但是正是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看来是那样地不可理解,那样地神秘莫测,那样地猥贱下流,那样地可憎可鄙。在他们心目中,每个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即是让自己钻进一个负载着大量金钱和财富的坟墓中去。而这一切只有当作某种反常本能,即拜金欲的产物才可以说明。”[5]在韦伯看来,由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笼罩之下,这种很难获得人们理解同情的新观念必须依靠新的宗教背景才能战胜强大的传统天主教伦理观念。因为,如果它不是通过某种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它不附着宗教的神圣意义,就根本不能在当时的欧洲立足。韦伯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恰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我们暂且还可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上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形。”[5]

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就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通过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斗争,新教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战胜天主教并发展起来,以新教伦理面貌出现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就在人们思想中扎下根来并推动资本主义行为快速发展,使欧洲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说,新教伦理就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奠定阶段的精神支柱,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早期阶段。

韦伯关于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看法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多元历史观。历史是由经济、政治、宗教、社会习俗等等因素组成的。历史的发展总是由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单纯的某一因素不能作为解释历史的基础,他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反对宗教或文化决定论。他说:“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些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

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须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教派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 [5]

四、新教伦理是如何具体容纳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

从《新教》一书的第三章开始，韦伯详细讨论了新教伦理的内容、教义基础。具体展示了它们是如何为新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伦理与教义基础的，从而论证了他的新教伦理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早期阶段的思想。

新教的核心观念是天职观，它一方面取缔了天主教遁世隐修的意义，一方面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现实世俗生活中。“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实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5]。在否定了遁世苦修后，天职观包含两种对职业的可能态度。一种是路德宗的态度：“个人应当永远安于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把绝对地顺从上帝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5]。另一种可能的态度是加尔文宗的：“从事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一项任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 [5]。个人应该积极地运用上帝赐予的能力、积极努力工作，增加上帝的荣耀。前一种态度还是传统的，对资本主义行为没有太大的促进意义。后一种态度才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所以说，天职观不会直接产生积极的资本主义的精神，还必须对天职观作进一步的积极的类似加尔文教解释。

天职观使教徒从遁世隐修转而投身现实生活，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则极大地强化了赚钱与节俭两个生活原则。但单纯的预定论也可能产生两种相反地对待世俗职业的态度。一种是消极无为的态度：既然上帝早已决定了谁将被救赎，谁将被罚入地狱，人的行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放弃一切努力，完全顺其自然地活着，静候上帝对自己的安排。另一种是加尔文教的积极态度：“一切生活现象皆是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着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你必须为上帝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如此。” [5]。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加尔文教选择了后一种解释？原因有二：其一，在加尔文宗看来，上帝的选民在现实生活中与被罚入地狱的人毫无外在差别，“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罚入地狱的人缺乏那种使人期待的‘决定性’，那种对上帝的笃信不疑。” [5]但这里的信仰不是路德宗那种纯内向的情感性虔诚，而必须表现为一种增添上帝荣耀的行为，“信仰必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这‘唯一的确定性’提供一个基础。” [5]所以善行虽然不能用来产生救赎，但它是选民的标志，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教徒必须努力劳动，创造出自己是选民的标志。其二：预定论在历史上存在许多形式，逻辑上绝对严格的预定论必然会产生一个非人性化的上帝，这会与上帝至善的德行产生矛盾。因此历史上的许多预定论面对这一矛盾软弱下来，不能贯彻到底。而加尔文则坚持逻辑上绝对的预定论，并通过如下方式克服了对上帝非人性化的非难。“随着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令的重

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以尘世的公正与否的标准来衡量上帝的最高旨意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亵渎神灵的。” [5]。这种绝对化的预定论认为上帝不仅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决定了未来，安排了每个人的生活行为。在这一教义背景下，教徒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每个行动都有着两面性：它既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上帝的安排。如果自己有着坚定的得救信仰，并系统地控制自己的生活，不放任肉欲，把自己作为上帝的工具来增添他的荣耀。这说明上帝就是如此安排自己生活的，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可见，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之所以没有产生消极后果反而产生了积极的赚钱与节俭行动的原因在于加尔文对“唯一的确定性”的理解和其预定论的绝对性。至于“证据危机”产生的极度焦虑感、个人孤独感、因失去通过忏悔方法缓解心理紧张而产生的苦闷感的作用主要是强化这种入世基调，使教徒的更加严格地遵循入世禁欲主义要求。所以麦金农否认“证据危机” [3]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的论证逻辑。更何况进一步的文献研究指出麦金农否认证据危机是极其草率的[3]。

韦伯认为宗教的理性化在加尔文教这里达到了逻辑结局。这里的理性化有两个含义：1、基督教的神学基点：上帝万能至上在逻辑上彻底化了，这必然导致绝对的预定论和绝对的“神恩独作”，必然摒弃各种达到拯救的手段的魔力，使传统的基督教彻底“去魅”。2、基督教实现了对教徒生活全面地、系统地控制。教徒生活围绕着宗教的终极目的完全理性化了。

五、新教伦理转化为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

有了新教伦理——这一早期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资本主义在行为层面上更理性化了、企业组织层面上也出现了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理性化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终于跨入近现代阶段，但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必然最终导致与新教创立者们主观目的完全相反的客观后果。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具备传统资本主义无法想象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巨大的财富则诱惑人们越来越远离宗教，韦伯引用了卫斯理的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这一过程：“我感到忧虑的是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那里的宗教本质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了，因而我看不出就事物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如何能够长久下去，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实的一切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 [5]。这一过程在社会现实上的表现则是：“最忠实的清教徒属于正在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升着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而在受恩宠的占有者中，甚至在贵格会教徒中，却经常可以发现抛弃旧理想的倾向。” [5]

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热情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就这样新教伦理精神褪去了宗教的终极价值，转变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人完全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获利不是作为灵魂救赎的手段而存在，反而一跃成了目的本身。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其根本要素与我们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已没有宗教的基础。” [5]

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富兰克林式的没有宗教理想为其提供合法性的精神观念肯定无

法在天主教世界立足，但这时的资本主义已大获全胜，它已无需借用宗教来战胜传统观念，它的内在逻辑强迫每个人建立起适应它的生活态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 [5] “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 [5] 韦伯甚至认为此一社会逻辑将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社会带入这样一个最终境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5]

六、总结

以上就是韦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这也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的逻辑构架。通过对这个逻辑构架的分析，我们看到，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精神是广义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把理性赚钱和消费节俭视为达到灵魂救赎的手段，在宗教理想的支持下打破天主教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近现代资本主义大步前进，创造了旧传统下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但同时它产生了新教创立者没有料到的后果：财富从一件教徒可以随时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一个不可撼动的铁笼。它使宗教的目的被渐渐淡化，手段性的赚钱与节俭成了目的。就像幼蝉破蛹而出，抛掉蛹壳成为展翅高飞的蝉一样，新教伦理退掉基督教的外壳，变为富兰克林式的狭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即韦伯在《新教》书名中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对因果概念持一种相对模糊的理解，把一个人的儿童时期视为他的青年时期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充分必要条件。再次强调，本文的这一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分析，不是在作者说的第二层面上的讨论，希望本文作的工作对第二层面的讨论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韦伯的整体思想脉络看，他把理性化视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近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宗教生活、科学艺术生活都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而由于宗教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宗教生活的理性化就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一个核心环节，由它带动了其他理性化的过程。韦伯的《新教》一书就具体论证了一个宗教理性化过程带动经济生活理性化的过程。当然韦伯也清醒地看到：理性主义是一个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完整的世界，理性化在不同生活部门的发展不是并行的，对于各个理性化过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 [5]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水雄.亲和性机制或“虚假”命题.社会学研究.2001（2）

[3]、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M].2001

[4]、张晓群.新教伦理诞生了资本主义？.书屋.2003(4)

[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6]、马涛.韦伯理论理解中的一个误区.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7]、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廉如鉴，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理论